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国际传播/朱仁夫, 魏维贤, 王立礼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04-4815-5

I. 儒… II. ①朱…②魏…③王… III. 儒家—
哲学思想—传播—世界 IV. B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485 号

责任编辑 张洪谱 陈 东
责任校对 林 林
封面设计 新空气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21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刘忠德

儒学国际传播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课题。

说它古老，是因为儒学作为一种普世的思想文化从一诞生起就开始了传播。儒学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孕育于尧舜和夏商周时代，正式诞生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轴心期”。儒学一经诞生，就开始了它的传播：孔子周游列国，推介自己的治国齐家修身理念；诸子百家争鸣，儒学以天人合一、民本仁政、明德中庸、礼运大同等“合理内核”，成为春秋时期一大显学，儒学也就在举世瞩目的争鸣和比较中，获得了认同和充分的传播，儒学的生命发展和传播品性自此形成。苛政与儒学是格格不入的，秦始皇施行“焚书坑儒”，阻遏儒学播传，但是历史很快结束了秦王朝统治，迎来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虽然这种提法未必完全妥当，但儒学开始了广泛传播，向边远郡县和东亚、南亚周边国家浸渐，开始了它漫长而又广阔的国际传播之旅，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说它新鲜，是因为儒学的国际传播，作为专题的研究，还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以来的事。近30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开始了又一次大的交流与对话。中国重新审视世界、投入世界，世界也重新发现中国、接纳中国。作为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大家都在“普世文明”的矿藏中寻找共同价值的东西，因

为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人文关怀的饥渴，连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在呼吁要回头 2500 年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这是时代的需要，科学发展的需要，建立地球村的需要。于是，国际儒学研讨会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纷纷召开，一批批研究成果发表、出版。儒学的世界性和国际化已在国际哲学界、汉学界形成共识，儒学国际传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新鲜课题。恰逢其时，《儒学国际传播》一书出版了！

儒学是世界“普世文明”的产物，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普世文明”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这正是孔子生活的时代。当时，世界各大文明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或先知，他们往往由于强烈感受到人们的现实行为和大众公认的规范之间的巨大鸿沟，开始了激烈的争论。从各个轴心文明中涌现出来的不是众口一词的响应，而是一些共同追寻的问题，“是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随时听到孔子和苏格拉底、墨子和霍布士（Hobbes）、老子和卢梭、荀子和柏拉图、韩非子和马基维利等等之间的对话。历史进入到 21 世纪，普世性的论域，跨文化的沟通，各种文明的对话，已经成为各国政要、思想家和哲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共享的“问题意识”，儒学国际传播，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在纪念孔子诞生 2555 年的时候，我们回顾孔子创立的“儒学”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成为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文本”，如何走向未来新的“普世文明”，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我们认为《儒学国际传播》是一部国际交往史。

思想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以国与国的交往为前提，儒学首传朝鲜，再传日本，这正是中国与朝鲜、日本交往的开始。朝鲜北部开始为“汉四郡”，儒学即以郡治政治思想传入。这都是国与国的交往。日本自通过百济传入《论语》后，对中国向往之至。公元 7 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依儒学思想制定“冠位十二

阶”和《十七条宪法》，开始“大化革新”，先后向隋唐一次又一次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问僧，开始了两国之间密切的国际交往。说到日本，中国与其“一衣带水”，公元838年，日本的遣唐使团竟达651人，光仁天皇设宴送行，授刀赠诗，嘱咐“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义必笃”，5艘大船，浩浩荡荡东来。这是国际交往史上的一件盛事。唐宋元明清以来，朝韩、日本就是通过与中国之间国与国的交往，深入广泛传播儒学，开“经筵”，行“释奠”，设“成均馆”，立“大学寮”，成为了举世公认的“儒教”极其鲜明的国家。

越南与新加坡是亚洲另外两个个性突出的国家。越南北方长期为中国的属地，儒学浸润自不待说。1075年，立国后的越南李朝仁宗，派员赴宋，仿宋制第一次开科取士，首考儒学，取士10人。自此，“东西南北由斯道，公卿士夫由此途”。尔后，越南立国学，建文庙，行孔教，蔚成风气，儒学成为了越南社会的“根本学说”、“固有伦理”、“国粹”、“国学”、“正学”……20世纪的胡志明主席自称是“儒家出身”，在他的领导下，越南与中国的交往奉行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民惟邦本”，“睦邻友好”政策。新加坡建埠立国只有两百年，立国前中国的驻埠使节（左秉隆、黄遵宪等）即推行儒家文化。立国后，总统黄金辉、总理李光耀等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一方面大力推介儒家伦理，与中国一直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李光耀先生后来被推选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儒学对越南与新加坡的国际传播，紧紧联系着中国与越南和新加坡的国际交往。

儒学传播西欧，也在国际交往的背景下展开，传教士建下了奇功，而传教士纷纷西来，开始都肩负着传教与外交的双重使命。意大利商人来中国之际，身兼外交使命和传播福音的意大利传教士孟德高维奴以教皇尼古拉四世特使身份于1294年到达中国。1582年，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来到中国，儒学的国际传播

开始了正式的旅程。尔后，在儒学的国际传播中，因“礼仪之争”罗马教皇与康熙皇帝进行了多次外交疏通，这些均载入了国际交往的史册。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听从科学家的意见，向中国派出了六位精选的数学家耶稣会士。1699年，法王派第二批耶稣会士赴清。这样，“中法两国在两位大君主路易十四和康熙之间，就开始了最早的学术联系与合作”，法国传教士一批批来到清朝朝廷，一面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一面向西欧译介儒学著作，使法、德、英、俄等国掀起了“中国热”。1816年，英王派遣以阿美士德爵士为特使的使团来中国，传教士马礼逊即为使团一员。1899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来华，翻译了大量儒学著作，后来兼任德国驻华公使学术顾问。1715年，沙皇彼得一世向中国派遣第一个“北京传教士团”。至1860年，共派了13批，约200人。传教与传播儒学相结合，传播儒学又与外交相结合，1842年，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外交官联合成立“美国东方学会”，以传播和研究东方与中国文化为宗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建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传教士司徒雷登还担任了美国驻中国大使。

回顾儒学两千多年的传播史，我们深深意识到：中国与朝韩、日本、越南、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国的交往，虽然受历史的局限，往往会带有宗教和政治的色彩，但都为儒学的国际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我们认为《儒学国际传播》是一部国际学术史。

培根说，“历史可分为自然的、政治的、宗教的与学术的。这里边的前三种，我以为是现在已有了的，惟第四种，我觉得还是缺乏。……少了这种学术史，我觉得如同玻里菲默的雕像少了那双眼睛，缺少了最能表现人的精神与特性的部分”。儒学脱胎于实践哲学，后又染上了宗教色彩，极具学术性。因此，阐释儒

学的传播史，就是演示儒学的世界生命史、国际学术史。

学术的主要载体是典籍，儒学国际学术史的原生形态是儒学典籍的传递与译介：

因为郡属和文化关系，儒学典籍最先传到朝鲜、越南，这是不争的事实。公元5世纪初，通过百济这座桥梁，儒学的主要典籍《论语》传到了日本。“《论语》传入日本，也就是日本儒学的发轫。自古以来，《论语》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圣典，上自历代的天皇，下至市井的庶人，始终讲究不倦。”（简野道明：《论语讲义》）。唐宋以来，朝韩、日本、越南等国通过遣史、派留学生、行科举，从中国弄回了大批儒学典籍。日本《本朝见在书目录》共著录汉籍1568种，凡16725卷，“当时中国国内存在的文献典籍的一半，已经传入日本”（《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日本还对儒学典籍进行了“和训”、“和点”。越南太宗二年（1435）起，官方刊刻《四书大全》、《五经》，颁布全越。1835年，越南明命帝将《四书》、《五经》、《小学集注》、《四书人物备考》刊刻、颁发给国子监及各省学校。

儒学西传，首先也是典籍传输。1697年，康熙皇帝向法王路易十四赠送了41部中国书籍，1722年，法国耶稣会士运回的以《四书》、《五经》为主的中国典籍4000种成了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最早特藏。17世纪初，柏林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交易中心，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威廉一世就收购了不少中国图书。1829年，德国东方学家诺曼赴中国收购6000部中文古籍、类书、丛书，分赠慕尼黑、柏林的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藏有中文书籍10万册，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明清古籍达3500种，剑桥大学也有十余万册中文典籍。1821年，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比丘林居北京14年，返国时带回中文典籍、文献12大箱，重14000磅，由15只骆驼驮运。中文典籍输入美国始于1869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地图书馆中文藏书达750万

册，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 400 多本手写本《永乐大典》、100 多种中国已绝版的方志。哈佛大学藏中文典籍 40 万册，其中大部分是经、史、子、集。

从学术的视角观察，因语言交流问题，西欧国家传播儒学还必须通过译介儒学典籍这一途经。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西欧译介《四书》为拉丁文的第一人，他一生共译著 19 种，其中入《明史·艺文志》的 6 种，《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的有 13 种。法国传教士金尼阁译《五经》为拉丁文，白晋译《易经》为法文，影响深远。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数十年潜心研究古老的中华智慧，译著儒学著作等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留华三十余载，英译了《十三经》中的“十经”，达 28 卷之巨，执牛津大学汉学之“牛耳”21 年。俄罗斯的《三字经》、《论语》俄文本竟有多种，当代汉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俄罗斯分会会长贝列罗莫夫（汉名“嵇辽拉”）于 1998 年出版《〈论语〉俄译本》，获总统颁发的“金质奖章”，2004 年，他又出版了《四书》俄译本。

任何学术史都是学术“生命史”。儒学在世界各国的生发和繁盛，带来了各国儒学著述的大量涌现。自古以来，每个国家对中国的儒学都给予了自己的诠释和再诠释。儒学的国际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儒学作为学术“文本”，在彼国彼地的生长和“本土化”过程。

儒学传播朝韩、日本后，忠孝观念成为核心内容，朝韩重“经筵”，在朝廷定期举办“儒学讲座”；重“释奠”，每年仲春、仲秋“上丁日”施祭，成均馆主享孔夫子，配享有“四配”和宋朝“六贤”，从祀的还有朝韩自己历代以来的硕儒“十八贤”。日本对中国儒学中的“理学”进行了精深的钻研，形成了一系列学派，日本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如“大化革新”、“明治维新”）都与儒学传播息息相关，近现代以来，日本重视儒学的经济伦理色彩，出版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涩泽荣一著）一书，令人

耳目一新。越南推崇儒学，与中国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儒学教育与科举取士。越南立国之初，即仿宋制开科举取士；科举应试，首先进行政治和道德考察，德才兼备者方能及第；科举发榜，极其隆重热烈，有时还“游街三日”；越南有科举 800 年历史，1919 年举行了世界上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此时中国已结束科举 15 年）。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和西方文化涌入的情况下，用儒学重新唤起社会道德伦理，重塑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形成了新加坡“国家儒学”。就这样，儒学在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传播与普及，慢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明景观：儒教文化圈。儒教成为了亚洲思想和文化的一个“标志”。

儒学传播西欧，也深深影响了西欧的文化与思想，影响了西方的学术和理念。西欧传教士、思想家和学者以西方文明的视角审视儒学，诠释儒学。首先，他们认为“耶稣”与“儒家”相通，孔子与柏拉图、苏格拉底一样，相信至高神唯一独尊（意大利利玛窦等人的观点）。后来，尽管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辩论的最后，还是耶稣会士的观点占了上风。其次，西方人认为儒学是实践和伦理哲学，在生活与人类实际的伦理及政治的纲领里面西方人“相形见绌”（德国莱布尼茨等人的观点）。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儒家伦理学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伦理原则与政治浑然一体，一是在政治与道德关系上道德列首位（法国伏尔泰语）。第三，儒学最值得西方学习的是它的“和平主义”（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而这正是解救西方文明危机的良方，“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英国罗素等人的观点）。英国著名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从公元前 221 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他预测：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儒家的“礼运大

同”思想。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多种文明共存，学术氛围也较自由。儒学在美国传播的时间虽短，但是生长发展却最快。现在，儒学成为了美国的一门“显学”。《儒学国际传播》一书中列举了美国一系列儒学研究成果，出版了“经学史研究”、“经学思想研究”、“《论语》和孔子研究”、“孟子研究”、“庄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清代儒学研究”等专题的学术著作近40种，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也如此繁花似锦。

以上说明，儒学虽然根植于中国，但是已经生长繁盛于世界，形成了“国际儒学”。

第三，我们认为《儒学国际传播》还是一部国际人学史。

人学思想在历史上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反对将天与人相互敌对，讲求天与人的统一。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孟子主张性善说，荀子主张性恶说，告子主张性无善不善说，世硕主张性善恶混说，王充主张性三品说。《论语》作为儒家主要经典，重点记载了孔子对于人生问题的观点。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同样重视人的研究。政治家伯里克利提出“人是第一重要的”，智者普罗塔哥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社会的动物。13—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得到弘扬，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如伏尔泰、洛克、卢梭、狄德罗、康德等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其基本思想是把自由、平等、理性和爱情看做人的本质，其思想模式是：“人性（人的本质）——人性的丧失（异化）——人性的复归（异化的扬弃）”，并用它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国际人学史，是

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

儒学，从本质意义上说，其核心内容是围绕天与人、社会与人、人与人、人与自己等方面展开的，“人”的安身立命，“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筑了“人学”的整个链条，所以儒学本质上就是“人学”，儒学传播就是“人学”传播。韩国梁大渊在《儒学概论》中指出：“仁者人也，圣人之道即人之道，人之道就是儒之道，……儒家之道，超然独立于各种思想之上。”儒学在国际上传播，充分展开了它的“人学”面目，与世界种种“人学”观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对话”，获得了广泛赞同和认可。可以说，儒学国际传播史，实质上就是国际人学的交融和发展史。

儒学一方面以“人学”的内涵与实质在国际传播，另一方面又借助“人”这一传播载体在国际传播，这个“人”是一个个群体、一批批精英。这里有经学博士，有外交使节，有中外留学生，有传教士，有政治家，有社会学家，有哲学家，有汉学家和中国学家，还有广大的海外华侨。他们用自己的口和笔，将儒学传播到了全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儒学国际传播史也是“人学”国际史。

欧美传教士，是传播儒学的又一主要群体。明朝末年，欧洲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交流，“两种文明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人成了主角：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前者是当时欧洲文化领域的佼佼者，后者则是传统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文人”。（〔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1581年至1712年，欧洲来华传教士约400多人，其中耶稣会士249人，多明我会士48人，方济各会士56人，奥斯丁会士17人，未入会教士30人。利玛窦是杰出代表，被誉为“基督教的孔子”。意大利的范礼安、罗明坚、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卫匡国、郎世宁、马国贤、罗光，法国的白晋、张诚、李明、雷孝思、巴多明、马若瑟、殷

弘绪、冯秉正、宋君荣、钱德明，德国的汤若望、戴进贤、邓玉函、恩理格、卫礼贤，英国伦敦差会的凯恩斯、马礼逊、徐懋德、米怜、麦都司、葛雅各、杨格非、理雅各，等等，这是一串闪光的名字。俄罗斯盛行东正教，东正教又称正教或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又一派别，18世纪初，俄国沙皇政府派第一个“北京传教士团”，至19世纪后半期，共有200多人的俄罗斯东正教徒来中国，罗索欣、列昂节夫、利波夫佐夫、比丘林、卡法罗夫、扎哈罗夫、瓦西里耶夫、斯卡奇科夫、科瓦列夫斯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汉学家，译介了大量儒学著作。19世纪初，美国创立了“基督教差会”，校仿法、德、英等国向中国派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雅裨理、布朗、晏玛太、丁韪良、明思溥、狄考农、乐灵生、穆德、李佳白、卫斐烈、司徒雷登等1500人的队伍涌向中国，研究中国文化、播传儒学。

儒学国际传播还有一个群体是欧美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精英，他们中很少有人来中国，但通过传教士带回的典籍和与传教士通信了解了中国文化和儒学，他们赞扬中国文化，赞扬儒学。如法国的培尔、马勒伯朗士、伏尔泰、魁奈，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英国的罗素、休谟、威尔斯、汤因比、李约瑟，俄罗斯的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科兹洛夫，美国的杜威、诺斯罗普、亨廷顿，等等。

汉学家、中国学家，是近现代儒学国际传播的又一个更大群体：朝韩的李相殷、金敬德、梁大渊、玄相允、金得槐、车相辕、柳正基、崔根德等；日本的儿岛献吉郎、井上哲次郎、贝塚茂树、阿部吉雄、沟口雄三、宇野哲人、木村昌人等；越南的武春浓、阮超、膺埕所、潘清简、潘佩珠、陈仲金、潘文阁、梁金定等；新加坡的吴德耀、陈荣照、苏新鋈、何炳彪等；意大利的安德烈奥奇、塞韦里尼、普依尼、诺瑟蒂尼、武尔披齐、白佐良、马西尼等；法国的雷慕沙、儒莲、伯希和、马伯乐、戴密

微、谢和耐、沙畹、葛兰言、石泰安等；德国的诺曼、帕拉特、硕特、嘎伯冷兹、福兰阁、佛尔克、傅吾康、福赫伯、鲍吾刚、莫日兹等；英国的理雅各、威妥玛、崔瑞德、亚瑟·韦利、葛瑞汉、傅兰雅、福斯德、安乐哲等；俄罗斯的波波夫、尼特费德林、阿列克谢耶夫、维塔利·鲁宾、贝列罗莫夫等。美国的汉学家队伍最庞大，《北美汉学家辞典》收录了 500 多人，其中卓有建树的有费正清、史华慈、克利夫斯、杜维明、赖德烈、芮沃寿、傅路德、陈荣捷、狄百瑞、毕汉斯、顾立雅、成中英等。世界近现代汉学家、中国学家，形成了世界儒学天空密集的星群，极为光彩夺目。

《儒学国际传播》一书已呈现在读者面前，朱仁夫、魏维贤、王立礼三人来自三地（中国内地、新加坡、中国台湾），共同研究这一古老而又新鲜的课题，历尽艰辛，联手撰著 2000 年来儒学走向世界、传播世界的历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国际交往、学术对话、人学融会的画卷。这是世界多元文明、共繁荣的见证，也是献给孔子诞辰 2555 周年的礼物。本人乐意为之作序。

2004 年 10 月

（作者刘忠德先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顾问，中国文化部原部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序 二

张立文

朱仁夫、魏维贤、王立礼三先生最近完成《儒学国际传播》一书付梓，我也曾于1996年与李甦平教授共同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又要召开“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故我乐为之序。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是最宝贵的，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的缺失，是一个民族、国家式微的表征；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是由其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作为支柱的。20世纪，中华精神在内外强力的振荡夹击下，特别是以空前激烈地打倒“孔家店”、“孔老二”，横扫一切旧传统的暴风骤雨地洗劫下，中华人手脚无措、无所适从：一方面要与传统的思想、道德、礼仪彻底决裂；另一方面新思想、新道德、新礼仪有待建构。在这种情境下，中华人不仅出现了精神缺失的空洞，而且表现为行为无范的空缺。在一些人中出现了精神无家园可归，灵魂无安顿之所。一个人无精神家园是痛苦的，一个国家无精神支撑是迷惘的。中华精神是世界华人的精神家园，是世界华人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也是一切喜爱中华文化人群的精神宝库，是人类“普世文明”生生不息的活水之一。

儒学自汉以后，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而且成为思想的主流。它既塑造了中华精神、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

念，也形成了典章制度、人性人格、待人接物、风俗习惯，等等。所谓中华精神，是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融突和合、天人合一、合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精神理念的总和。

同时儒学亦超越国家、民族，传播到东亚、南亚各国，并在与所在国的传统学术思想相融合中，形成了具有所在国特色的儒学及其精神资源，成为东亚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长达几百年之久。因此，儒家文化也成为这些国家、民族精神重要构成因素，形而上的理念，并渗透到百姓日用之生活交往活动之中，影响百姓的意识思想。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早在春秋战国之时，人民密切往来。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为引进、受容，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融突期，以儒家经验理性的道德伦理为特征；后一阶段是发展、创新，与对佛道文化批判的和合期，以理学儒学的道德的形而上、下相合一为其特征。细分可为四个阶段，前后均可分为二：西历前三世纪左右到三国时期为传授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为融合期，是为前期；李朝为造极期，具有性理逻辑思辨伦理的特色。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李朝灭亡为延续期，是为后期。在此四期的演变过程中，儒学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儒学自身的理论形态的变更、思维内涵的日新等内外因缘的变化，而呈现出其朝鲜化的特色，这些特色是朝鲜半岛儒教精神的精华，也是朝鲜半岛民族精神的体现。一是忧患的强烈性。儒者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它是一种忧国忧民、对国家生命和人民生命存在的人文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体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变化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表现；二是逻辑精微性。李朝性理学家善于逻辑的思辨和概念、范畴的分析和综合，从阳村到退溪再到南冥，他们依自己深切的体贴，对性理学的经典文本作出独创性的注释，其所构筑的范畴逻辑结构的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动态性、清晰

性，可与中国宋明理学家相媲美，而体现其精微性；三是性情的深刻性。由儒教的心性论而深化为性情论的四端七情论辩，这是在探讨人间与存在的根据的形而上学问题时，落实到人世的性理问题上，而展开理气这个属于形而上、下世界与心性的四端七情关系的论争，促使了朱子学的朝鲜化；四是融突的和合性。“花郎”的精神信仰、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便演绎为“花郎道”。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说明它是把忠孝的儒教伦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教自然风骨、行善莫恶的佛教戒律相融突而和合为“花郎道”的。

此外，朝鲜半岛的儒学还具有修道的教化性和学脉的传承性。从而成为“东方礼仪之邦”。就韩国而言，直至当今仍保存有完善“成均馆”组织机构。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西历 372）设立太学，新罗神文二年（682）设国学，高丽圣宗十一年（992）设国子监，忠烈王三十年（1304）国子监改名为成均馆，它相当于国立大学。其中等教育机构便是“乡校”。目前韩国全国约有 360 所乡校，在“成均馆”便挂有全国“乡校”分布图。我曾访问过众多“乡校”，如东莱乡校、丹城乡校等。不仅“成均馆”有“明伦堂”，“大成殿”建筑，而且每个“乡校”都有“明伦堂”、“大成殿”，并挂有孔子的像。“丹城乡校”创建于高丽仁宗五年（346），现在山清郡丹城面江楼里 592 番地。“成均馆”（太学）文庙享祀正位文宣王，位西、殿西、西庑为 57 贤人；位东、殿东、东庑 57 贤人，两庑加朝鲜半岛 18 贤人，共计 132 贤人^①。“乡校”的大成殿要比“成均馆”大成殿面积小，故正位为文宣王，位西为曾子、孟子，位东为颜子、子思；殿西为程颢、朱熹，殿东为周敦颐、程颐；西庑为崔致远、郑梦周、郑汝昌，李彦迪、金麟厚、成浑、赵宪、宋时烈、朴世采，东庑为

^① 《享祀图》、《太学志》（上编），栗谷文化院 1970 年版，第 36—37 页。